

现代社会“物质生产”中的 “个人”与“总体”

——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导言”^①再解读

聂锦芳

摘要 “导言”是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并引发了巨大争议”的篇章，鉴于多种复杂的情形，长期以来对其文本内容的解读、思想的把握并不细致、到位和透彻。身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1857—1858年危机”之中，面对由于资本无序投机和金融动荡造成的“泡沫经济”的危局，马克思选择“物质生产”作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占首要地位的“对象”；将“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归结为“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以此来阐明“物质生产”中“个人”的主体地位；基于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并通过近代以来多种思潮的透析，强调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以“独立的个人”为旨归；根据愈益复杂的社会结构提出“生产是总体”的思想，并在“生产一般”与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同生产类型和部门的整体统摄的意义上加以把握。马克思的这些思考对于当今全球化时代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批判功能和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 1857—1858年危机 物质生产 独立的个人 总体

作者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1-0005-15

引言 重新解读“导言”何以必要

思想史研究有一条“铁律”，即经典著作需要反复研读，且“常读常新”。“导言”是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并引发了巨大争论”^②的篇章，也为我们所熟知。很多论者在梳理马克

① 这部手稿的名称现在弄得比较混乱。我们梳理一下迄今为止的称谓：MEGA2称其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57/58*）；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有两种说法：《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苏联时期则叫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以上名目下所包含的文献也略有差异，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只包含“货币章”“资本章”，而不把其他手稿列入。有鉴于此，我主张将马克思这一时期撰写的、与其制定“政治经济学原理”计划有关的所有文献统称为“1857—1858年手稿”，且不再使用书名号（因为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将其作为一部著述予以刊布的考量），也不出现“经济学”字样（因为它探究的虽然是资本社会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但是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社会学说等领域较之前有了极其重要的推进）。概言之，这部手稿囊括了以下文献：1. 马克思从1857年1月、8月至1858年5月在8个笔记本（标识为“M”和“I—VII”）上撰写的“巴师夏和凯里”“导言”“货币章”“资本章”以及对这两章内容的“增补”“7个笔记本的索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和第三章开头部分。2. 马克思1857年10月到1858年2月编写的3本关于危机的摘录、笔记（*Crisis Notebooks*）。3. 马克思从1856年下半年至1859年初就相关问题与恩格斯等同道进行的通信。以上材料构成一个丰富、复杂而深邃的“思想库”。

② 马塞罗·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思想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和阐释其资本理论的时候都会提及它，更有研究者对其重要段落乃至文本内容进行过详略不一的解析。然而，检视迄今为止的研究，我认为存在着如下的不足。

其一，这部手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危机之书”，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1857—1858 年危机”催生的产物。然而，很多论者却基本上是在抽象的哲学层面上理解“导言”并引用其中的论断，并没有将这一文献所表达的思想及其论述逻辑置于当时特定的情境之中，与马克思为应付危局而赋予自己“双重”的理论任务（加强对“当前的危机”的研究和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①）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探究，因而也就无法体悟马克思何以在触目惊心的资本扩张和投机所引发的金融动荡中却“反差”性地用“物质生产”来“对自己的工作定位”的良苦用心和深长用意。

其二，对“导言”文本内容的解读始终处于不细致、不完整的状态。在西方学界，即便非常看重这部手稿的研究者，对“导言”文本内容的解读也大都失之简略、粗陋，甚至外在和“离谱”。我们不妨检视一下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情况。自称撰写了有关这部手稿“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研究著作”的内田弘，在对“导言”内容进行解读时，刚引用了第一句话“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②，就撇开马克思随即提及的斯密和李嘉图、文化史家、卢梭乃至斯图亚特等，岔开话题，迫不及待地要“从对黑格尔的批判开始”进行阐释^③。安东尼奥·奈格里以《〈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为名的著作则并非系统的专著，而是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九次讲座讲稿的辑录，除了指认这部手稿“不仅是一本经典性（genetico）的著作，而根本上是一本展望性（prospettico）的著作”外，就文本解读来说实际上徒有其名——专门讨论“导言”的第三讲由于执念于“证明扩充我的假设是有充分理由的”和“对抗性趋势的方法”^④而放弃了对内容的细致梳理。马塞罗·默斯托主编的论文集《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年》中提供了一篇他自己撰写的关于“导言”的论文。在对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时，也是首先引用了手稿中的第一句话，还没有认真分析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分歧，就直接跳跃到了对第二自然段内容的论述。^⑤ 大卫·哈维则在新近出版的关于这部手稿的研究著作中公开声明，鉴于这是“马克思在一个相当疯狂的时期内疯狂地写给自己的笔记”，“最有趣也最难处理”，因而他拒绝那种“非常细致、深入、系统的阅读”，因为“以这种方式阅读，为了弄清楚仅仅几页的意思，读者很容易花上一周的时间”。为此，他选择只“聚焦于《大纲》中被马克思定义为中心任务的事情”。他对于“导言”的解读也照此准则处理——他把我们以下要解读的第 1 节的丰富内容仅仅概括为“对自由主义个人观的批评”^⑥ 来敷衍。

其三，在苏联，曾经阅读过这一手稿并首次将“导言”刊布的考茨基“不知道如何处理”其思想，只好将它视为与其整理的《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完全没有关联的两部著述。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专门负责完整的“1857—1858 年手稿”整理工作的保罗·维莱拉（Пола Велера）则没有留下任何涉及其思想的公开文字。而对包括这部手稿在内的《资本论》“准备材料”做过大量文献学考证的维戈斯基（В. С. Выгодский），则因“导言”“没有打上辩证唯物主义（这导向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印记”^⑦而看轻其理论分量。倒是国内有个别研究者发表过关于“导言”的专题论文，紧扣内容细致地解读过其思想。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在这一文献研究上的粗疏状态。但是，由于受苏联传统观念和研究思路的影响，这些论者对“导言”思想的把握，倾注在“物质生产”中的“物质性”和一般唯物主义原理的强调、辩护上，而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何以在“个人”和“总体”间关系的意义上诠释“物质生产”的深刻意图。此外，这些论者也没有体会到，马克思这部手稿不是通过对他人及其观点的驳斥来证明其思想的正确、完善和真理性，而是借助对有关问题的不同主张进行对比和辨析，逐步探索和廓清自己的思路、观点和框架。换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2 页。

③ 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中文版序言、第 32 页。

④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66 页。

⑤ 参见马塞罗·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年》，闫月梅等译，第 38 页。

⑥ 参见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Grundrisse*, Verso, 2023, p. IX, 2。

⑦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 66 页。

之，马克思在这里不是宣布真理，而是探索、锻造、推进理论。所以，该手稿所提及的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在内的数量庞大的思想家，既是马克思的“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对象，又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和参照，因而也成为马克思思想建构的“参与者”。由于这些研究者并不理解这一点，导致其细致的解读并没有达致应有的效果——呈现不出马克思探索的宽广视域和驳杂图景，思考中经受的痛苦、犹疑、矛盾和反复，以及凝练出的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变动性和开放状态，反而在对“导言”的总体把握、思想建树及当代意义阐释方面逊色于西方学者的某些“洞见”。

正是基于以上的清理和省思，我们力图站在当代思维和现实境遇的制高点，依据完整而权威的文献重新启动对“1857—1858 年手稿”这部重要著述的研究。不仅要弥补以往关注不够乃至并不知晓的文献部分的讨论，更要对“导言”这样似乎已经熟悉但并未理解透彻的篇章加以更为细致、深层次的解读。本文就是为此而做出的努力，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分析其中第 1 节的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原理”与现实经济状况的关联及“错位”

“导言”开宗明义，马克思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materielle Production）。”^①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对象”不是指现实实践中呈现或发生的状况，而是指构成马克思理论探究的课题。也许有人会问：对于重视理论在现实中的“满足”及“实现的程度”^②的马克思来说，难道现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就是其理论探究的“对象”吗？二者确实紧密关联，但并非“直接同一”。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水准”，总是认为“实践第一”或具有优先性，而理论只是对实践被动、机械的反映。殊不知，在经受过德国古典哲学浸润和熏陶并超越出来的马克思看来，实践不同于单纯的物质运动和自然变化，它本身是人所参与的社会行为和运动，受到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价值观念的引导和理论框架的支配，所以始终存在着“哲学世界化”与“世界哲学化”双向互动。不仅如此，理论既与现实实践相互关联，也因存在明显的差异而相对独立，而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理解、反思和透析又离不开思维严密、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这样，对理论探究与现实实践做相对的区分就显得非常必要和关键了。所以，只有回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加以比照，马克思“对自己的工作定位”这句话的深刻用意才能显现出来。

1857—1858 年间，欧洲和美国遭遇了一场普遍性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颠覆了传统的“危机”观念——如果说，以往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基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自然灾害因素等造成的贫困、饥荒和物资短缺等状况，这次危机的症结在于，普遍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投机泡沫等导致金融动荡、民生艰难、阶层分化和社会困局。

这次危机最突出的现象是资本无节制地扩张与投机。起初在单一部门中进行，诸如“粮食的、铁路的、采矿的、银行的、棉纺业的”等行业，后来“投机活动得到特别蓬勃的发展”，竟至成“狂”，“相继侵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部门：借贷资本、商业、工业和农业，很快便带有普遍的性质”。除了各部门、各行业之外，更跨国度展开，所以这种普遍性还体现出世界性，“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很快便蔓延到德国。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这个漩涡”^③。

身处伦敦的马克思密切关注势态的变化。他从 1856 年上半年开始撰写大量分析这一事件的文章和通讯，发表于当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伦敦的《自由新闻》上。马克思特别注意和预见到，投机向借贷资本的渗透，最终将引发金融动荡。在一系列探讨信贷货币关系的文章中，他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状况，特别是 19 世纪 50 年代非常发达的期票信贷领域，作了卓越的分析。

马克思起初关注的是工业和贸易的状况（比如生产的规模和产量、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值），但后来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2 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21。

^②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54、XII—XIII 页。

目惊心的经济事件渐次发生，他开始密切留意作为世界金融市场中心的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变动，作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黄金较之白银的贬值以及白银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从欧洲向亚洲的流动。马克思撰写的关于当时著名的法国期货公司 Crédit Mobilier 的几篇评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该机构的投机行为和交易“伎俩”充分暴露和体现出这场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更由此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混乱的程度，最终会遭致惨烈的后果。

马克思的分析不限于罗列和铺叙经济现象，而是力图从中寻找内在的机理和走出困境的道路。要摆脱危机，显然仅在经济领域寻找方案不能奏效，政治因素和政府的职能也起关键性作用。但马克思检视当时各个国家的政治情势，发现一系列举措和作为不仅无助于困境的改善，反而加剧了危机。

受这场危机侵袭最大的是英国，因为它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而金融的根基是工业，这是国家繁荣的根基。但这次危机中金融动荡将这一根基摧毁了。面对这一困局，英国两个传统的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不仅无所作为，而且相互推诿，并且逐渐变成了贵族党，最终与资产阶级妥协，变成了两个轮流执政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与英国的情况不同，法国在危机时期出现了革命的征兆，因为危机所引起的工业停滞、农业困难、商业萧条等威胁着国家的财政，最终动摇了波拿巴政府的地位，而这“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①。被祖国褫夺了国籍的马克思也关注了普鲁士政治的发展，特别撰写了《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新内阁》等文章。延续其早期在《莱茵报》《新莱茵报》上展示的批判锋芒，马克思再次极其严厉地抨击了普鲁士官僚制度向国家社会生活一切领域渗透的专横，认为这种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基础在于把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变成僵死条文的反动宪法，进而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保存，是由于资产阶级采取了怯懦的态度，他们一心所想的只限于拼命追求有利可图的国家职位。

马克思更清醒地意识到，以上经济泡沫和政治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外在的、短时的现象，要“使公众认清事情的实质”，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是创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借此从结构上透析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进而建构起完整的框架体系，这样才能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着眼于“勉强躲过逼近眼前的危机”。^②

据此，就不能将哪怕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③ 视为自己理论研究的直接对象，而是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突出“物质生产”的地位。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即便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中，大量堆积和到处流通的商品的价值也源于生产过程中凝结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创造了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运行。

随着资本的扩张，金融资本、股票、债券等非实体经济活动活跃起来，虚拟经济逐渐形成。这些虚拟资本虽然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但通过金融市场影响资源配置。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一旦脱离物质生产，就会导致经济泡沫。当虚拟资本过度膨胀，与实体生产完全脱节时，必然引发金融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显现，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它会因虚拟经济的扩张而加剧，最终导致危机。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危机的表面现象是虚拟经济的危机，但其根源在于这种形式的经济运行方式与物质生产的脱节。质言之，物质生产才是经济的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它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还塑造社会关系，推进历史进程。理解物质生产是理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关键。所以，必须以“物质生产”来定位自己的工作。在写作这部手稿前后，马克思翻阅了不下 40 部类似“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书，它们基本上都致力于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微观问题，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为己任，而回避对深层次、根源性问题的探究。这样，马克思以“物质生产”来探究资本时代的经济社会问题，就显示了不同的思路、旨趣和方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4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141、14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80 页。

二、对作为“物质生产”主体因素的“个人”的多维度透析

但是严格说来，“物质生产”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有领地，对其展开探讨也非自马克思始。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历代思想家特别是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基本要素和运行过程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并且纳入各自独特的经济学体系当中。马克思非常清楚，他所建构的新原理必须将对“物质生产”的理解推进到“当代水准”。

为此，马克思虽然将“物质生产”列为其经济学首要的研究对象，但紧接着便强调，它的主体因素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换言之，所谓“物质生产”应该这样来界定：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是其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① 随之，马克思在这一自然段有限的篇幅内，提及18世纪以来5个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展示了他们各自把握人的问题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倾向，并且进行了悉心的比较和辨析。

其一，作为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从“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出发把握社会历史变迁进而阐释其经济学体系。

斯密和李嘉图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学体系建构的原则与社会历史演进的先后顺序之间应该是“倒置”关系，相反认为二者是彼此链接、直接对应的。比如，斯密认为，由于现代的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度来源于初期的野蛮社会，那么经济学的探究也就应该准此序列从后者出发进行探究。而统摄两种社会之间的是同一原则，即将“获取各种物品所需劳动量之间的比例”视为“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以“猎人”为例，称“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而这一思路可以直接演变为现代资本运动的原则，即“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而且他认为这种推延“是很自然的”。^② 无独有偶，李嘉图同样认为，“社会的早期阶段”与“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时期之间，“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其他各种商品的变动”；“在社会的早期阶段中，猎人的弓箭和渔人的独木舟与工具价值相等，耐久性也相等，两者都是等量劳动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猎人一天劳动的产品——鹿的价值——就会恰好等于渔人一天劳动的产品——鱼的价值”。这一“投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原理”，虽然由于后来“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耐久资本而有了很大的变更”，但只是“引进了另一个使商品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原因，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涨落”。^③ 也就是说，时代已经判然有别，在他们那里，经济学规则却是不变的、一致的。

以上根据现代社会之前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人类经济生活的样态来观照18世纪的物质生产，撇开资本时代个人之间复杂的社会背景而以孤立的单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讨论诸如“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影响商品价值的……劳动”等问题。如果在17世纪经济学起源时，出现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如今已经完全不同的情势下依然这样做，对于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创新能力才有助于新经济学的建构来说，体现的只能是研究者“想象力”的“缺乏”。这样的讨论已经不属于科学研究，而是像文学上的“虚构”，一如丹尼尔·笛福在其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杜撰的故事。

其二，以威·瓦克斯穆特、威·德鲁曼、古·克列姆等为代表的文化史家^④，通过想象和理想化的方式表达对现代“过度文明”的不满，进而呼吁回归一种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

这些通过各自不同的著述清理过人类文明史进程的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劳动异化、物质主义泛滥、环境恶化和社会分裂等，破坏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导致了道德和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页。

^②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1页。

^③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1、18、22页。

^④ 马克思的《伦敦笔记》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派别的线索。他在1852—1853年期间阅读并在第XIX、XX和XXI笔记本中所做的摘录中，涉及三部文化史论著：（1）威·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1850年莱比锡版第1部，1851年莱比锡版第2部；（2）威·德鲁曼《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3）古·克列姆《人类文化通史》1847年莱比锡版第6卷，1849年莱比锡版第7卷。

的堕落。这种“过度”“发展”不是“文明”的进化，而是倒退。与此对照，他们又常常将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如原始社会、古代社会或中世纪）理想化为一种“自然生活”，认为那时人类的生活纯粹而和谐，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正常而健康。据此，他们提出，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归历史上的“自然状态”或“原始文明”。

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文化史家对“自然生活”的强烈兴趣和向往是一种误解和幻觉。他们忽略和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不懂得与历史上所谓“自然生活”相伴随的是生产力的低下、社会的不平等和人类对自然的无力控制，他们却将如此落后的生活状态简单化和浪漫化了。因此，这种基于想象和理想化的方式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和现实，更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实际的物质条件之上，而不是依赖于对过去的浪漫化想象。

其三，卢梭超越自然主义哲学基础的政治理论，试图通过社会契约（Contratsocial）的方式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

卢梭也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这种状态下的人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然而，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的发展，人类便进入了不平等和冲突的状态。与上述文化史家不同，卢梭认为，恢复自由和平等不是回归“自然状态”，而是在现实基础上人们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问题，即每个人让渡部分权利以换取共同体的保护。这样，通过自愿协商，就可以将在自然状态下“天生独立的主体”联系起来，并且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如国家、民族、集团）。

这里需要辨析的是，卢梭提出的所谓“自然状态”也并非基于他对历史事实的考察，而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他明确表示，自然状态可能从未真正存在过，而是一种用来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因此，他的理论并不依赖于对自然状态的真实描述，而是通过这种假设来推导出社会契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所谓“社会契约”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也不是自然法则的直接体现，而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是人类理性选择的产物。质言之，卢梭学说的建构依赖于理性和道德原则，而非自然主义。

也正因为如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必然忽视现实的物质基础，虽然有解决社会不平等和冲突问题的愿望，但无法真正解释资本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寻找到切实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他的各种设想和方案不过“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是由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某种抽象的契约或自然状态决定的。

其四，作为“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的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将现代社会的“个人”视为“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的实现，认为“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

在这些“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存在一种“合乎自然的个人”，他们具有天赋的生命权、财产权等权利，因而是自由、独立、理性的。社会和国家应该通过这些独立的个人自愿联合而形成，这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也是历史的起点。显然，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也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也是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假设和美好诉求。但他们将这种个人视为一种永恒不变的价值体现和理想存在，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这种个人开始的。

与这种理解不同，马克思认为，“个人”并非自然的产物或者由某种抽象的自然法则决定，而是历史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个人的特征和行为方式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其地位也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18世纪的预言家”之所以形成“合乎自然的个人”的观念，不过是对于经过16世纪以来漫长而艰辛的“准备”、积累和变革，并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一种“预感”。至此，人类进入了受资本支配的自由竞争的时代。同时，“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也培育、塑造出新型的属于“18世纪的个人”。如果说，在过去的历史时代里，自然联系使个人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那么，现在它摆脱了这种联系，也就不再是归属任何人群的附属物了。质言之，这种新型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态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更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资本社会中的“个人”与封建时代的“个人”之所以有着本质的区别，基于他们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巨大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页。

异。因此，不存在那种永恒不变的“合乎自然的个人”。

由此看来，“18世纪的预言家”观照“个人”的方式也具有理想化、非历史化的特征；影响所及，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和李嘉图也以此为依据建立其学说。而要害在于，这些人都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个人”的社会本质。

其五，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是不多的例外，他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的思想家不同，能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思考社会和人性，从而避免了上述局限。

作为与斯密同属苏格兰区域的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斯图亚特的很多看法却与18世纪主流思想（如启蒙思潮）相对立，他更多地站在贵族立场上思考问题和生发观点。如前所述，当时的“新潮”思想家普遍强调个人自由、自然权利、理性原则和社会契约，认为社会和国家是通过独立的个人自愿联合而形成的，并将“合乎自然的个人”视为历史的起点。斯图亚特的思考则更注重历史和经验，而不是抽象的自然法则。他认为，社会和经济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由某种永恒不变的自然状态或社会契约所决定。与启蒙思想家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不同，斯图亚特更关注社会秩序、等级体制和传统的延续。他认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需要依赖于历史形成的制度和权威。斯图亚特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认为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能基于自然法或理性原则设计出来并起决定作用。这种历史视角使他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避免了18世纪思想家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的理论倾向的局限。

这样，马克思就在宽广的比较视域中，通过对作为“物质生产”主体因素的“个人”内涵的辨析，找到了与以往的思想家区别开来、把政治经济学推向当代的突破口。

三、在与共同体的纠葛中从“孤立的个人”走向“独立的个人”

马克思在这里用了“Individuum”^①一词来表述“个人”，也可以翻译为“个体”。在德语语境中，通常是在辨析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时使用这一概念的，用以强调一个人作为独立、不可分割的单元的价值和权利。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关“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人（个体）的解放”次第推进的设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有关“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阐发，以及《共产党宣言》中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来对“联合体”所做的限定，都是非常典型的范例。至此，马克思又承接了这一思路和论述，并且将“个人”的内涵具体到经济社会发展、“物质生产”的历史变迁和现实表征之中加以考察。

与上述理想化、非历史的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追溯真实的历史，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越往前追溯，“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②，而是必须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或共同体。马克思还根据当时历史学研究提供的流行的理解，罗列出个体所归属的这些“共同体”形式演变的先后顺序：最初是自然形成的“家庭”，之后是由家庭扩展起来的“氏族”^③，再后来是通过各氏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公社”，最后到18世纪形成了“市民社会”。^④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即现代社会。与之前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各种共同体形式相比，对于这种形态下的个人来说，虽然依然生活于社会之中无法脱离，但对社会的依赖性却大大降低，独立性空前增强了——社会只是达到其私人目的的手段，一种外在于个人的必然性和框架。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用“政治动物”来给人下过定义。这里的“政治”在宽泛意义上指的就

^①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1, S. 2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页。

^③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是“Stamm”一词。这一术语在当时的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了近代所谓的“氏族”（Gens）和“部落”（Stamm）。

^④ 对于这里陈述的共同体形式演变中“家庭—氏族—公社—市民社会”的顺序，马克思后来依据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中的考证和论述，对前两个形式的位置做个颠倒：将“氏族”作为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原始形式，认为在“氏族”纽带解体之后才发展起“家庭”。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做了全面的阐释，并为《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脚注（50a）（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7页）。

是“社会”。但这只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双重诉求和表征——“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① 就是说，一方面，个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他人，只有与他人结成共同体形式，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又有一种超脱社会的内在动机和愿望，总想抗拒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控制和摆布，力图从社会关系和流行观念之网中挣脱出来，培育、锻造、彰显和发挥自己的个性。但是，后一方面又只能沉浸于复杂的现代社会之中，才有逐步接近、改善和实现的可能。也会有诸如孤立的个体脱离社会，跑到荒野中从事生产、生活的传闻，但在现代社会这是比较罕见的事情，并不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性。即便如此，这种人与没有在现代社会中生活过的人也是不同的。他已经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浸染，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而且如果说偶然“逃离世界”，短时间尚能生存下去，但肯定不会持久，更不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这就如同一个人不与他人在一起生活，彼此之间不进行交谈，却幻想他能充分掌握流行语言并有所“发展”一样，纯粹是不可思议的。如此简单的道理和推断，本不需要多加解释和说明；但在人与社会关系被弄得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做点辨析还是必要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据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历史性关系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实质性地位，将现代社会之前与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状态用两个概念区分和界定，即“孤立的个人”（Das isolierte Individuum）和“独立的个人”（Das unabhängige Individuum）。前者是离群索居、寄寓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准和简单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人；后者则身处密集的社会群体之中，为涌动的财富之流和驳杂的关系之网所裹挟，但却力图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关注个人的自由、自主和理性能力，渴望成为有自我意识、能自我决定的主体。

以上是基于历史状况和发展逻辑做出的分析，但思想史却并不是依此呈现的。至此，就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需要解释。上面的叙述表明，人类的演进就个人与社会关系而言，是从“孤立的个人”转变为“独立的个人”的过程，且“独立的个人是启蒙运动的理想”。但是，为什么只有在 18 世纪这个迄今为止社会关系最发达的时代，才出现了“孤立的个人”的概念以及如上文所提及的从这一视角出发观照“物质生产”的观点、思想和作品？这表明，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二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现实表现却既可能是同向累计、递进的，也可能是反向错位甚至背离的。充分考量这种情形，才能懂得对于那些不明历史状况和现代性内涵的人来说，即便是“18 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②。除了上文提及的那几个派别的思想家外，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也郑重其事地将从“孤立的个人”视角进行的分析，引进其最新的经济学成果中来了，这就使马克思感到需要把“本来可以完全不提”的情况甄别一番。比如，蒲鲁东等人就是“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③，声称在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亚当或普罗米修斯那里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成型的想法，而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这些想法一一践行、实现了。坚持这种思路的众多思想家一再重复这些“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对照复杂的资本运动和人的现实境遇，让马克思深感，没有比它们“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四、“生产是总体”：“一般性”规定与特殊的历史形式

探索至此，马克思转而对“生产”本身做出讨论，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思想（Die Produktion ist Totalität）^④。

对非历史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的质疑，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只需从历史科学、纯实证角度来理解经济现象，把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上的生产情况一一加以梳理就可以了；或者一开始就声明，自己研究的只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生产，比如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而不顾及其他历史阶段的状况。为此，马克思强调从“总体”出发观照、把握和透析“生产”，意在对此种非此即彼的、单一向度的思路进行纠偏、补救和超越。

首先需要考量的是，一切时代的生产虽然存在差异，但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5、25、25—2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7 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1, S. 23。

定”，这就是“生产一般”（Production im Allgemeinen）。^①这是一种思维抽象。面对不同时代纷繁复杂的生产形式和样态，研究者需要通过过滤、选择和淘汰，然后综合、概括和提炼，最终将其共同点撷取、确定下来，免得在研究中陷入现象的汪洋大海，不得不在细节或枝节上耗费精力和时间，重复用力，因此，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②。

不过，更进一步也要明确：这种生产一般，即经过思维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不是教条，不是概念，其本身也是一个体系，是由许多部分组成、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具体说来，首先，有些共同点属于所有时代，比如，构成物质生产的基本要素有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产品等，或者从哲学上表述，“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③。不论生产力水准如何，只有具备了这些要素和条件才能名之为“物质生产”，否则只能是动物本能的谋生活动、上帝创设世界的神话和专事“思想”经营的行为。其次，有的共同点则为几个时代所具有，比如，私有财产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之后又历经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阶段达到完善和成熟状态，即便在不同地域、国家和民族呈现出多种形式和样态，但它们在总体上都属于受私有制支配下的生产。最后，有的共同点和规定性为最新和最古时代所分享，比如，生产资料和财产归国家、集体或社会共同所有的公有制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的共同财产制度时期，但在现代意义上，它又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密切关联。总之，不论以上哪种情形，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没有这些共同性、一般性，“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④。

但是，至此又必须注意到，共同点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抹煞差异性；相反，只有在差异的对比中才能显现出这些共同点。这就如同我们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⑤。构成“生产一般”的种种规定性被抽象出来，意旨就在于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遗忘了本质的差别。

那些试图论证和阐明现存社会关系的永存与和谐的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⑥。他们通常是这样来思考和推理的：首先，进行生产的前提是具有生产工具，“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其次，进行生产还必须有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即“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再次，由以上两条衍生出结论：进行劳动还必须有资本，因为资本“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这样，就如同生产工具、劳动技能和经验一样，资本也被视为进行生产的前提条件，是跨越不同时代的“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上述思考和推论的症结在于，“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⑦。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之前，“生产工具”作为进行生产的物质手段（简单的如“手”，复杂的如机器、工具、设备等），“积累的劳动”所包含的劳动者通过反复实践积累的技能和经验，以及“过去的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主要体现于物质层面和物的关系，属于普通的生产资源和技术要素。到它们被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控制、支配，或者体现出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时，就转化为“资本”。尽管资本“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但已经不是以往的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了。质言之，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言：“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⑧资本只属于现代社会，因为是它塑造了现代社会，使现代社会打上了其深刻的烙印，标志着社会的现代转型。

但是，回过头来说，资本的“诞生”又奠基于以往“物质生产”发展和历史变迁之上，是其长期而艰难的变革的必然结果。包括凯里在内的经济学家不理解社会的结构及其关系，不理解历史运动的条件和规律，而是抽掉了“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只把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解释为统治者的意志和“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借助以上的辨析，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生产总体”中所包含的“生产一般”及其历史特殊性的内涵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1, S. 23。

^{②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26、26、26、26、26—2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7—878页。

界域，进而为剖析资本与生产关系的本质、揭示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了科学基础。这种科学基础的理论表达就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建构。同时，马克思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原理与历史、事实有关，但不是它们亦步亦趋的跟进、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所进行的解释、透析和超越。所以，为了以后叙述中严格体现这样的意旨，他再次强调了有关“生产一般”与“特殊生产”之间关系两个维度的要则。

其一，“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①。就是说，如果没有生产一般所揭示的那些共同点和规定性，就不可能有通常的生产。在现实中，就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看，生产总是由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组成，就是说，生产是一个总体。但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具体的生产技术（工艺学），它不描述和罗列生产部门具体情况，不像统计年鉴那样展示生产所达到的水准和指数，而是从特定社会阶段中的生产中把握一般规定与特殊形式之间的关系，探究生产中体现的社会关系及其规律。尽管论述“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但明确这一原则非常重要。

其二，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社会条件下单纯的物质、技术状况和过程，而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由主体（“社会个体”）进行的涉及多个部门、众多领域的总体性行为，更由此显现出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每个个体在物质和精神诸方面的境况。科学的叙述（理论分析）与现实运动（实际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尽管马克思同样不准备在此对其详加阐释，但还是感到对这一层面再做强调的必要性。

至此，马克思又一次在手稿中重写了一遍三个概念：“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Production im Allgemeinen. Besondere Produktionszweige. Totalität der Production.）^② 这是他反复琢磨的记录。概言之，生产既是普遍的（“生产一般”），又是特殊的（“特殊生产部门”），并且始终是社会的整体性活动，而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将其作为总体（“生产的总体”）来观照。长期以来，很多论者有关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并没有体悟到他在此盘桓、躑躅、徘徊的苦心，也就没有理解马克思为何如此重视、不惮重复这一原则的用意。

五、经济学体系建构方式检讨及其涉及的“两个要点”

思维原则是一回事，在具体作品的叙述中如何落实、体现这些原则则是另一回事；它们之间也不是直接移植、一一对应的。“生产一般”是对作为特殊生产共同性的抽象，它反映着物质生产的普遍规律；但是，试图将其作为思维原则来推导出对特殊生产的说明、解释和透析，却是不可能的。可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将二者混同的情况却并不少见。

当时经济学家时髦的做法，是将其著作的开头设计为“总论”，并就一般性问题作出说明。这种“总论”部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罗列进行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③。比如说，约翰·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第一编《生产》就是这么处理的。其第一章的标题是“论生产要素”，一开始就指出：“生产要素有两种：劳动和适当的自然物品”，之后又扩展至“资本”。^④ 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意图是想“摆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但进一步深究其内容，就会发现，对这些要素的论述要么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的归纳，要么只是重复显而易见的道理。即便将这些规定扩展起来（诸如该书将劳动分为“所需粮食的劳动”“用于生产原料的劳动”“制造工具的劳动”“保护劳动的劳动”“产品运输和分配的劳动”等）进行的说明，也都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物质层面和技术指标，从中看不出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体的生存状态。另外，诸如“生产需要劳动”这样陈旧的说法，尽管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见解。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种对生产“一般条件”的论述看似宏观而全面，但实际上内容空洞，缺乏深入的分析，不过是“浅薄的同义反复”。^⑤

①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7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1, S. 24。

④ 参见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6、73页。

二是或多或少涉及不同的社会状态对促进生产发展所提供的条件。马克思以《国富论》为例，亚当·斯密在该书第8章“论劳动工资”中分析了人们“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前进”）下的“幸福”“安乐”生活和“在社会静止状态”（“停滞”）下的“艰难”“困苦”处境；在第11章“论地租”中又讨论了“社会状况的改良”和与其“相反的情况”下“土地的真实地租”的“抬高”和“减低”。斯密是在这两章的结尾处做出这些概述的^①，马克思将其称为“具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里突破了关于生产的单纯的物质层面和技术指数，而触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状态。但是，斯密还只是做了一种“提示”，尚待“提到科学意义上”详加阐释和说明，那就需要“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②当然，这已经超出了“生产一般”的范围，更适合在讨论资本竞争、积累等具体问题时展开。

至此，马克思辨析了两种“一般的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③。也就是说，鉴于“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人们通常会认为，“生产高峰”就是其“历史高峰”，可以用前者来衡量和标志后者，二者可以合二为一。对此，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生产（工业）的发展是通过扩大生产、积累财富进而实现利润增长来实现的，这是其“谋取利润”阶段；只有当资本通过垄断、金融等手段来维持利润水平，进入“维护利润”时期，社会才达到其“历史高峰”。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在马克思看来，美国人在生产（工业）发展上胜过英国人，因为美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谋取利润”，而不是“维护利润”，美国人身上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中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气象；而处于“历史高峰”的大英帝国已经像一个养尊处优的迟暮之人，即将老去和衰落。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种、气候和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更有利于生产。^④谁都知道，生产和创造财富需要具备主观和客观因素。前者指人的劳动、技能、创造力等，后者包括自然条件、资源、气候等。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撇开主观因素、仅基于客观条件来讨论生产是多么片面，即便将二者全部考量在内，认为它们“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这就如同“条件越好，结果越好”一类的陈述，同样不能说是错误的，实际上也不过是重复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又是同义反复”。更何况，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虽然对生产有影响，但不能就简单地以此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差异，因为真正的关键之处，还在于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

还需更进一步追究，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在“总论”部分会不惮浅陋，不忌“同义反复”，以这样的方式来陈述呢？其真实意图何在？还以穆勒的著作为例，他对不同时代的情况不加区分，一再强调诸如“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经济学原则，并将其上升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来阐发。这样，在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内才能产生的东西趁此机会就被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⑤。这就意味着，经济学家们的这一整套手法是带有“多少有意识的目的”的。但是，一旦抛开现实的经济关系，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看法的荒谬性也随之显现。比如，与上述原则相关联，如果说生产受限于以上所提及的人种、气候和自然环境等条件，那么，在他们看来，与生产不同的分配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和变换；征之以历史，哪个时代是这样的？这种没有从“生产总体”上进行的分析和阐释，无视复杂的现实状况，导致“生产一般”脱离了“特殊生产”的演变，最终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粗暴割裂”了。

当然，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就如同在不同的生产中可以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性一样，在分配中也还是可以消弭这些历史差别而抽象出一般的规律。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等获得生活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第75、243—244页。

^{②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7、27、28页。

^④ 无独有偶，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其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采用了与马克思这里几乎完全一致的论证思路。他们是在排除了“人种”“地理”“文化”“无知”等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该书将其称为“假说”）之后，才转向对制度的专题研究，认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走向繁荣还是趋于衰败”（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页）。从该书的参考文献看，马克思的著述只有《资本论》第1卷一种，因此无法判断此书的论述思路是否直接来自“导言”的启发，但马克思思想对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资料的具体形式可能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这种分配方式维持了他们作为体力劳动者在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生存。而那些不事生产甚至不知稼穑艰难的“食利者”阶层，诸如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所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等，他们获得社会产品的方式又不同于奴隶、农奴、雇佣工人等体力劳动者阶层，而产生这种新的分配方式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和水准已经不同于以往，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综合经济学家们的讨论可以看出，在“生产总体”上涉及“两个要点”。

其一是生产与财产（Eigentum）的关系。

一方面，“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①，这就意味着，生产本身就是对自然的占有，而占有（财产）是生产的必然结果。因此，将“无财产”作为前提条件来讨论生产是荒谬的，如果没有财产（占有），就谈不上生产，也谈不上社会。“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的，占有本身就意味着对某种东西的拥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仅仅强调这一点又是不够的，甚至又“是一种同义反复”。就是说，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财产，而在于区分财产的历史形式。因此，不能从“这里一步（承认财产）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共同财产、私有财产），并将其视为生产一般的前提条件，特别是不能从“财产是生产的条件”直接延伸出“私有财产是生产的条件”。因为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财产形式，私有财产是在共同财产基础上变革和超越的产物，它并不是生产的唯一形式，更不是最原始的形式。从历史上看，共同财产才是原始的财产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吉克尔特人等的“公社”所有制。因此，不能将某种财产形式（尤其是私有财产）视为生产的永恒的自然规律。

这样，马克思通过揭示在生产与财产关系问题上容易陷入“自相矛盾”和“同义反复”的症结，阐明了财产与生产的同一性、必然性以及财产形式的历史性和变动性。在以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此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于前者更是讳莫如深。

其二是司法、警察等对财产的保护（Sicherung desselben durch Justiz, Polizei etc.）^②。

在一般意义上，财产是人的劳动所得，保护财产则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激励个人上进的重要手段。财产的保护主要通过法律制度（如民法、刑法）和国家机器（如警察、司法系统）来实现。所以，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个意义上的财产保护。但是，如果把这种意义上的财产保护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司法、警察制度等对财产的保护无原则地混同，将后者视为保障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而看不到它在“保护”名目下对资产阶级特权私利的谋求，那么“财产保护”就沦为一种空洞的陈词滥调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每一种生产形式都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法的关系和统治形式；相应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便产生了现代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警察制度。这些制度并不是中立的或永恒的，而是与特定的生产形式紧密相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视了这种有机联系，将法律制度与生产形式之间的关系看作偶然的、外部的联系。这是其观点之“粗率和无知之处”。他们认为，现代警察制度比“强权”更有利于生产，但他们忘记了在前现代社会，“强权”本身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只不过更为赤裸裸和残酷罢了。在资产阶级的“法治国家”中，强者的权力仍然存在，只不过披上了“法律”的外衣。所以，这种财产的保护本质上是保护统治者的利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维护经济秩序、促进正常发展，但也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以上的分析使马克思确信，生产方式每一阶段都会产生特定的社会状况。例如，封建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同，与此相应呈现的就是不同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但是，这种“对应”也不是亦步亦趋、同时变换和完全契合的，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势和粗略的状况，也会出现错位、混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一种新的社会状况刚刚出现时，旧的生产方式可能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旧生产方式的冲突会导致生产上的紊乱；同样，当一种社会形态已经衰亡，旧的生产方式可能仍然残存，而新的生产方式尚未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8 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1, S. 25。

全确立，这同样会导致生产上的紊乱。这些紊乱可能表现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或阶级冲突，其程度和影响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的实际状况。

最后，马克思再次强调了“生产一般”的特征及其功能发挥的界域。就是说，“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那些规定性，确实是存在的，但它们不是直接呈现的，而是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是思维抽象、概括的结果。作为“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allgemeinen Bedingungen aller Production*)^①，它们过滤掉了不同生产阶段的特殊性，抹杀了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些一般性要素虽然适用于一切生产阶段，但由于它们过于笼统和高度抽象，仅仅依赖它们，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六、全球化时代“导言”的现实意义和方法论启示

至此，本文完成了对“导言”第一节内容的细致解读。笔者不惮琐屑，不避艰深，近乎做到了巨细靡遗，特别对于文本中很多费解且不连贯的表述，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内涵诠释和逻辑化处理，敬请方家指教。

马克思一生的写作生涯长达50年，留下卷帙浩繁的著述。他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而使用了不同的写作模式，比如，其生前发表过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为出版而写作的严谨的著作，乃至出于思想阐释和体系建构而留存下来的著作初稿等，在写作思路和表述风格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导言”文本又不同于这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当时马克思还处于其思想的实验和摸索阶段，这份手稿相当程度上是为自己清理思路、辨析问题而留下的思想记录。诚如哈维所说，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头脑中拥有的一切工具和观点，乐于释放自己的意识流，以表露各种可能性和潜在的相互关系”。这导致像哈维这样长期研究马克思的资深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而又令人沮丧、富有想象力而又时而无聊重复的文本”，感到它“难以理解、令人生畏、使人困惑”。^②但是，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放弃对其展开精深研究的理由；毋宁说，它提供了我们走进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的通道，更构成了对解读者能力和耐心的挑战。

由本文的辨析不难看出，这里涉及的问题确实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复杂的情形，导致马克思在提及一方面观点并加以说明的同时，又需要顾及另一方面相反的情形，使得他对前者阐释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只是点到为止时，就需要转向对其另一方面的强调；而随后又发觉，这“另一方面”也潜伏着与其表面相反但同样不能矫枉过正的危机，所以旋即就得返回前面的观点……双方兼顾，前后纠结，迭次循环，使得在原稿中，马克思几乎使用遍了德语中有“转折”“否定”意味的连词和语气词，诸如aber、doch、jedoch、allerdings、dennoch、obwohl、trotzdem、weder … noch、nicht、kein等。^③对此，中文译本并未全部翻译出来，而遗漏了这些词汇，仅依据中文所表达的段落和句子，很难体会马克思原初多方面复杂的考量。所以，即便有比较可靠的译本，精深的研究还是需要借助原始文字来校订其表述，特别是甄别核心范畴的内涵，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地体会和理解文本中的思想。

尽管存在上述状况，事实上，经过马克思细致的辨析、阐述和论证，在本节中确实形成了系统的思路和深刻的看法。我们谨概括如下：身处“1857—1858年危机”之中，面对由于资本无序投机和金融动荡造成的“泡沫经济”的危局，马克思选择“物质生产”作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占首要地位的“对象”；将“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归结为“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以此来阐明“物质生产”中“个人”的主体地位；基于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并通过对近代以来多种思潮的透析，强调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以“独立的个人”为旨归；根据愈益复杂的社会结构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思想，并在“生产一般”与各个历史阶段“特殊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同生产类型和部门的整体统摄的意义上加以把握。^④

毫无疑问，这是融现实与思想、时代与历史、实践与思维于一体的深刻思考。其中所生发的众多观点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1, S. 24。

^②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Grundrisse*, p. IX, VII.

^③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1, S. 22–23.

^④ 除这两个维度之外，马克思“生产是总体”的还有第三个层面的意思，即生产体系中“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所要解读的范围，我们将另文详加阐释和讨论。

其严密的论证，不仅有助于马克思把握那个时代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建构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为后来《资本论》的构思和写作做出扎实的探索和厚实的铺垫，而且即便放在 20 世纪资本社会的演变和当代全球化的情势下也有重要的启示。在此，我们简略阐发如下。

其一，全球化时代“物质生产”的意义。

“导言”一再强调，现实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身处当今全球化时代，当我们回溯包括“1857—1858 年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下半叶乃至整个 20 世纪的变化时，一方面在显性层面会有“沧海桑田”“今非昔比”之感，另一方面在深层次上追究又会疑惑“历史何以如此惊人地相似”。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反映了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时代的变化，但它们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显现。仅就经济层面而言，马克思从定居伦敦开始，就密切关注在生产、贸易之外，资本投资和金融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在当今时代，虚拟经济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更加交织变幻，复杂而紧密，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塑造、左右着全球经济的结构及其运行。一方面，虚拟经济为物质生产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技术创新；通过金融衍生品等手段，帮助物质生产部门分散和转移风险；虚拟经济中的价格信号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物质生产部门调整生产结构。但是，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资源过度流向金融等领域，挤压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源空间；虚拟经济中的投机行为扭曲价格信号，误导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决策；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形成经济泡沫，泡沫破裂会对物质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这种情形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所展现，只是与当代在程度、地域、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和一致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导言”中突出“物质生产”的意义即便在今天也依然重要。当资本无序投资和金融动荡引发经济泡沫的时候，强调物质生产的作用不是落伍、过时的表现，相反，它仍是重要的“救世良药”。正如当年马克思深刻揭露英格兰银行、巴黎证券交易所和法国期货公司 Crédit Mobilier 的各种作为与危机爆发之间的内在关联，当今世界经济的复苏也不能完全寄托于纽约曼哈顿华尔街、伦敦金融城乃至沪深证券交易所……，而在那些先进的高科技研发中心、广袤的黑土地上的粮食基地、密集的制造业生产厂区和高速铁路建设的工地……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其二，“物质生产”中“独立的个人”的主体地位。

“导言”的现代意识体现在确立了“独立的个人”在“物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一般的“物质生产”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指的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生产及其流通过程。社会化大生产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生活资料和到处流通的商品，但它更重要的意旨在于，借助这些物质财富为人类的文明和精神生活奠基，以培育和塑造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前文所梳理的马克思在辨析“生产总体”时归结的“两个要点”，鉴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之间的分歧，在以往研究中通常认为马克思是排斥它们的。然而，深入的文本解读表明，将生产与财产（占有）紧密关联，再对这种财产加以保护，也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主张。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将财产、财富与个人的劳动相挂钩，确保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具有了物质基础和条件，不再是“无根的漂萍”“浪漫的幻想”和“纯粹的思辨”。现代社会为培育“独立的个人”提供了重要机会，当然也带来了挑战和风险。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促进教育公平、加强道德教育等措施，助力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全面发展。同时，个人也需要在市场经济中保持理性思考，避免被物质利益和消费主义所束缚，追求更加完整和独立的人格。这也是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对当代发展的启示。

其三，从宏观、总体、系统的视角把握和观照复杂问题。

“生产是总体”是一个闪烁着方法论光芒的卓越的命题。面对资本时代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问题，马克思以此来揭示迄今为止这一“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内在矛盾、历史渊源和未来命运。仅就经济层面而言，遍及全球的发展停滞、债务危机和金融泡沫等问题，其根源在于资本的系统性矛盾和历史境遇，而不是当下的个别政策或市场行为所致。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剖析，既从现代社会的特定状况和全球格局出发，又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大趋势加以把握，所以，他不仅是资本最严厉的批判者，也是资本最到位的理解者、其症结和病根的诊断者。马克思并不悲观，其理由是标志着人类由野蛮迈向文明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为更新、更文明的社会形态和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着条件。以

作为生产方式当代变革新阶段的数字经济为例，一方面，它确实通过数据垄断、算法控制等手段，将劳动力、消费者甚至社会关系纳入资本积累的范围和逻辑当中，但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完善的法律体系、市场规则和道德、舆论力量，从数据权利保障、资源公平分配、技术教育结合、社会参与协作和伦理价值观引导等方面入手，推动社会变革和技术创新，进而有助于建立起更加公平、民主和可持续的数据经济体系。而这又为个人在数据资本主义时代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当代复杂问题的把握和解决，不仅需要批判性的分析，还需要在历史的进程中寻找变革的可能性。“导言”为我们提供了从宏观、总体和系统的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变革的基础和方向。在当今危机与变革交织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批判功能和方法论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完整文献的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研究”（24AZD0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The “Individual” and the “Totality” within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of Modern Society

——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Introduction” to the “1857—1858 Manuscripts”

NIE Jinfang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to Marx’s “1857—1858 Manuscripts” is a section “of extreme complexity and great controversy.” Due to various textu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s of its content and underlying ideas have long lacked sufficient detail, precision, and depth. Writing in the midst of the “Crisis of 1857—1858”—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Marx confronted the crisis of a “bubble economy” generated by unrestrained capital speculation and financial turbulence. Against this backdrop, he identified “material production” as the primary object of his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reducing “production at a certain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 “the produ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in societ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individual within material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hroug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various modern intellectual currents, Marx emphasized that “material production” in modern society ultimately aims 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individual. He further proposed the notion that “production is a totality”, which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in general” and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forms,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ve unity among different types and sectors of production. Marx’s reflections in this regard continue to possess powerful explanatory force, critical potential,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he crisis of 1857—1858, material production, the independent individual, the totality